

跨文化交际研究新动态

2015

陆建非 戴晓东 主编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上海三联书店

跨文化交际研究新动态

2015

陆建非 戴晓东 主编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研究新动态. 2015/陆建非,戴晓东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4
ISBN 978-7-5426-5404-5

I. ①跨… II. ①陆…②戴… III. ①文化交流—文集
IV. ①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1735 号

跨文化交际研究新动态. 2015

主 编 / 陆建非 戴晓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张 / 24.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04-5/G·1411

定 价 / 5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地球村的常态与必需(代序)

陆建非

无论是国家或是族群之间的交流,还是在同一民族文化之下的各个亚文化或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跨文化交际现象自古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但作为一个学科,跨文化交际约莫在 20 世纪中叶才初见端倪。

1959 年,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在其《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它标明了不同文化接触时出现的特定交际群体。《无声的声言》是跨文化传播(交际)学的奠基之作,视域宏阔,洞见深邃,思辨犀利,观点清晰。霍尔按知觉程度将文化分为显性、隐性和技术性三个层次;按内部构造将文化分为元素、集合和模式。他对“文化教学示意图”的讲授,可谓“解机析理,探幽发微”。尤其从文化变革的视角切入,大胆提出“文化即是交流”的命题,掷地有声,想象无限。他首倡“时间语言”和“空间语言”,旨在帮助人们在文化层面上挣脱桎梏,不落窠臼,在“和谐世界”的构建中树立文化自信与自觉,激励各国民众消除藩篱,摒弃猜疑,彼此尊重,互相借鉴。

跨文化传播(交际)学之父爱德华·霍尔筚路蓝缕的精心之作前无古人,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学术魅力经久不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人投入到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与实践中来。

然而,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学者们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就如同对“文化”(culture)一词的诠释,不下有几十种,包括各抒己见、视角不一的界定,然而,定义迭出,学者们还是乐此不疲,足见只要冠以“文化”之名的研究,其影响一定久远。

Samovar 和 Porter 于 1999 年提出:所谓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互动。(1999:19)之后,Lustig 和 Koester 在 2003 年提出另一个定义:跨文化交际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共享的意义。通常当重大的文化差异造成对有关如何沟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期望时,跨文化交际就产生了(2003:49)。而 Jandt 则在 2004 年对此定义进行了拓展:跨文化交际不仅仅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个体交流中,同时,也存在于不同文化的群体交流中(2004:4)。当跨文化交际学传入我国后,著名外语教育家胡文仲教授亦根据众多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1999:23)。

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期,研究者开始聚焦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简称 ICC)的研究,当时仅是为了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例如跨文化商务咨询、跨文化培训等。Ruben(1989)提出,许多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包括个人海外生活、工作以及海外机构建立在内的众多实际问题。从这一角度定义主要专注于跨文化能力的直接行为表现。因此,这类定义通常被认为较为片面、肤浅,并且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难以被广泛地接受。(Spitzberg,1989)

在众多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中,Spitzberg 于 1989 年提出了最为普遍且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即“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为实现特定的目标,以一种特定方式在交流干扰出现时相互交流的能力”。2002 年他又修正了这一定义,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具体环境中,人们感知到的行为的得体性和沟通的有效性”。这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动态定义解释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是交流的合适以及高效。

在国外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广泛定义中,我们应关注 Chen 和 Starosta 提出的定义。Chen 和 Starosta(1998)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有效且合适地管控交流行为以实现预定交流目标的能力。这个定义显示,有能力的交流者不仅应当知道如何在特定环境中与人进行有效且合适的交流,也应当知道如何运用自身能力来实现他们的交流目标。据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维度: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性,跨文化熟练度,同时也代表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方面: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个定义以及维度的划分独特新颖,而且在实际应用中十分灵便。

总体而言,国外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间交流、文化

冲击、文化适应、跨文化培训、跨文化管理以及外国学生咨询等方面(Wiseman, 2002), 国外的研究者们业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进行理解, 这便导致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同定义。

笔者在向研究生教授《跨文化交际与双语教学》课程时反复强调, 无论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解读或诠释,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时都持有某种期待和预判, 概括而言, 就是四个关键词: 顺畅(smooth)、得体(appropriate)、有效(effective)、愉悦(enjoyable)。这也可视为跨文化交际成功与否的要素或标准。(陆建非, 2012, 2014, 2015)

从上述不同定义, 我们看出, 不同的研究者对跨文化交际学有着不同的兴趣点和着重点, 而这些兴趣点和着重点逐渐演变成了目前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特别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 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文化冲突与融合, 人类面对越发增多的共性问题, 亟需达成更多的共同诉求, 跨文化交际探索的疆域因此不断拓展, 形形色色的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的碰撞、调适与整合, 在很大程度上, 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遇。

Porter 和 Samovar 在 1988 年最先提出了跨文化交际重点研究的三个方面。一是思维交流, 包括信念、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等; 二是言语交流, 包括语言和思维方式; 三是非言语交流, 包括非言语行为和时空概念。不久, Porter 在 1990 年又列举了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八大因素: 态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角色和角色期待、语言、空间、时间、非言语表达。他指出, 这八大因素并非独立存在的, 而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相互影响。2000 年, Porter 和 Samovar 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 将之前的三个方面、八大因素浓缩为四个要素: 观念、言语、非言语和语境。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使用非言语方式进行交流, 但不同文化的非言语行为通常所代表的意义不尽相同, 甚至大相径庭, 这也就是为什么非言语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015 年 6 月 4 日笔者领衔召开了题为《城市跨文化交际能力——全球城市的重要考量》研讨会, 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 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会议持续四个小时, 气氛热烈, 意犹未尽, 几十家主流媒体作了报道。作为主持人, 我在开场白中说, “今天研讨的话题就是上海如何在未来 30 年成为全球城市这样一个愿景下, 把我们城市的多元文化营造好, 使海派文化、中国传统文

化、异域优秀文化在人类共同文明的平台上交流交融,在上海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缩影,展示各自的景象。因此,我们首次清晰提出了‘城市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概念,并将它视作全球城市的重要标杆。可能有的同志会问跨文化交际能力到底指什么?这种能力指的就是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实现顺畅、得体、愉悦、有效的交流的能力。放大到城市层面,就是一种城际间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海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世界城市,积极培育和提升城市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凸显城市品牌个性,增强城市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从城邦到城镇再到城市,眼下发展到(大)都市,甚至都市圈(群),人类城市化的进程与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齐头并进的。当今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且很快将会有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世界将不得不面临如何让城市更适合人类居住这个问题。城镇化的速度迅猛异常,1950年,全世界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1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4%。到2050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全球共有28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中国占了六席。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和竞争,说到底,就是看几个大都市的底气足不足。讲到文化软实力,讲到文化包容、沟通、调适的能力,不也是从都市的角度俯视,更着边际,更得要领吗?本文集收入的《城市跨文化交际能力——全球城市的重要标杆》一文,是笔者和研究生、青年教师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所得。

本文集主编之一戴晓东博士在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研习不止,硕果颇丰。尤其是他花了很大功夫,精心策划筹办两年一度的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于2008、2010、2012、2014年成功举办了四届,主题分别是“认同与跨文化交际”“跨文化适应与转化”“跨文化能力与互动”“冲突管理与跨文化和谐”。每届会议都以“高学术水准、明确的主题、多元化的视角和深度的研讨”为宗旨,吸引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与机构的领导者以及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会,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并探讨该领域内的各种热点、焦点、交叉点,推动了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成为上海师大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论坛。本文集中的不少杰作来自最近的研讨会。

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变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加拿大传播学家M. 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

的《媒介即信息》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地球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相互间变得更为了解、理解、善解、谅解。地球村现象的产生颠覆了我们以往的交际观和发展观,唯有唇齿相依,求同存异,携手共进,方能分享成果,和平共处。由此,跨文化交际形成常态,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必需。反观我国现状,不容乐观,甚至十分堪忧。由笔者领衔的课题组开展了大规模社会调研,从问卷中发现,在回答“是否修过跨文化交际课程或接受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这个问题时,外籍人士回答“是”的占 50.63%,上海本地人士选“否”的占 62.56%,在沪外省市人士选“否”的占 73.97%。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在沪外籍人士选修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课程或接受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而大部分上海本地人士和外省市人士则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跨文化交际类的课程与实践活动在海外很多高校的课程设计中必不可少,课时量也较大,而在我国高校,即便位于发达程度较高的开放性城市,这类课程也并未纳入学校的必修或重要课程之列。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上海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对民众开展有针对性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与各国各民族的交流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彭世勇对 2000 年至 2010 年 10 年间发表在我国 CSSCI 类 528 种学术期刊和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 1043 篇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论文进行数量对比分析后发现,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还没有成为主流性的学术研究。在这 10 年间,发表在 CSSCI 类学术刊物上的跨文化交际论文只占全部已发表的跨文化交际论文总数的 13.5%。我国绝大多数跨文化交际论文(86.5%)都是刊登在非核心、非主流或不知名的学术刊物上,而在我国不少大学职称评审时都被列为“不算数”的论文。正因为有“算”与“不算”之标准,我们便遭遇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如果不积极努力地提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将永远落后于国际主流研究。(彭世勇,2010)

不少学者对中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差异进行比较后还发现,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文章中(如 2006—2009 年),占最大比例的是跨文化翻译,其次是跨文化语用学,然后是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而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趋势则表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中,占比最大的是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培训。(杨健,2014)

杨健的研究还把国内跨文化研究内容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综述、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跨文化翻译、跨文化语用学、专题;国外跨文化研究内容也可分为七类:理论与研究方法、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培训、跨文化交际与外语研究、种族歧视、跨文化交际能力、专题。(杨健,2014)

此外,从研究方法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是非实证研究,缺乏严密的科学方法。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以演绎、归纳为主的非实证研究被广泛接受,但是随着西方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的引进,如今以观察和实验法为主的实证研究快速增长。尽管实证研究的比例相对较小,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尝试开展跨文化交际学的实证研究。与此相反,国外此类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国外学者更相信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中数据的运用更为可靠,实证研究在信度和效度上均胜于非实证研究。此外,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中,国外还强调定量研究,因为西方学者更注重精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国内主要是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并认为以此可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杨健,2014)

杨健对2006—2009年发表的国内外部分学术期刊论文开展了调查,按照实证和非实证研究进行统计,总计100%,国内的实证研究占14.71%,非实证研究85.29%,非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又分为定性、定量、混合定性定量三类,总计100%,其中定性研究占20%、定量研究25%、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55%。由此可见,国内研究中,绝大多数为混合定性定量研究。同样按照实证、非实证研究进行统计,总计100%,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实证研究占86.11%、非实证研究13.89%。显而易见,国外大量的研究都是实证研究,非实证研究仅是一小部分。另据统计,在国外研究中,定性研究占9.03%、定量研究76.77%、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14.19%。可以看出,国外研究中定量研究占绝大多数。

我认识一个朋友,叫邓文东,是荷兰皇家热带学研究院(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de Tropen, KIT)驻中国总代表,我请他在研讨会上演讲,说说荷兰值得借鉴的经验。荷兰皇家热带学研究院这个名字本身就透露出浓厚的跨文化色彩。该机构早在1910年就已成立,在殖民地时代,是宗主国的遗产,她的主要任务是为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提供研究支持。如今荷兰皇家热带学研究院已演变成一家旨在促进国际及跨文化合作的非营利机

构。存留的业务主要是促进国内外交流、文化交流和合作、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培训。KIT 早在 1917 年就第一次举办了印度学讲座,培训那些来自政府部门及殖民地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在,培训对象主要是著名荷兰跨国企业和政府部门,所有派往世界各地的高管都会在临行之前带着他们的小孩甚至家人到该机构接受培训,旨在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的地方的生活与工作。该机构的专家网络遍布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全球项目超过 500 个。还出版过不少相关书籍,如《怎么对付荷兰人》,20 年来版本不断更新,每个到荷兰去的人都可买到这本书。邓先生多次提到阿姆斯特丹的包容性,由于很多前殖民地的居民移居荷兰,大多在阿市,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最多元化的欧洲城市,其半数居民为外国人,来自 179 个国家或地区。因此阿市政府想方设法打通管道,建立平台,把各个裔族的文化展示出来,让市民了解生活在周边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的文化,以此推动多元化建设,提升彼此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除了收录一些有价值的同行感兴趣的老话题论文之外,如跨文化翻译、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等,本文集还特别关注国内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动态,如赴海外专业人员和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中城市的角色研究,尤其在非言语交际方面,如公共空间的行为文化、域外者集中的社区管理、都市跨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跨文化沟通顺畅愉悦的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城市跨文化识别体系的完善等。有些论文聚焦青年学生和志愿者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这也极具现实意义。实证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弱项,故我们收录了好几篇拿数字说话,以案例讲理的论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有几篇是我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文章切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因此,不少作者大胆真诚地建言献策,为政府支招,彰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此行文,笔者称之为“顶天立地”,“顶天”即拥有全球视野、“立地”就是紧贴当地的社会现状。

是为序。

2015 年暑假于上海师大六教楼

CONTENTS

目
录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地球村的常态与必需(代序) 陆建非 / 1

跨文化适应 / 1

从濡化到适应: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跨文化心理适应质化研究 安然
魏先鹏 / 3

西南内陆高校国际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以西南财经大学为例 罗双好 王永梅

周羽丰 于晓 罗雪 / 22

美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研究 严文华 车笠 / 35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 67

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文化素养的培养及其改革与实践 陈白颖 / 69

对外汉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 刘晓玲 / 76

免费师范生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实践之反思 曾敏 / 85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 95

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古诗误读、误译与改写——以庞德《华夏集》为例
朱伊革 / 97

论英语习语翻译的翻译策略 谭卫国 / 106

美的移植——王维诗歌及其英译研究 翁洁 / 116

跨文化视域下《红楼梦》章回目录英译的互文性研究 赵朝永 / 129

跨文化交际域的中菜译名探析

——以哈佛广场旁的燕京饭店为例 陶原珂 / 143

跨文化比较研究 / 157

功能语言学视野下汉英特殊类词语：“侥幸”类副词性关联词语比较研究

原苏荣 陆建非 / 159

中韩演讲稿指称衔接手段对比分析 朱会敏 / 177

文化视野中的许国璋《英语》和《新概念英语》教材比较 孙为群 / 185

明清北京与华盛顿城市空间建构的比较解读 颜晓晔 / 198

中美大学网站首页设计的跨文化比较 王亚男 / 213

跨文化商务沟通课程中美之比较 谭慧玉 / 232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 / 247

城市跨文化交际能力——全球城市的重要标杆 陆建非 颜晓晔

王丽敏 / 249

基于赛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间——镇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

略 毛艳枫 李新朝 / 258

如何对外国讲中国故事 王洁 窦卫霖 / 269

东方灵感下诗意的追问：克罗岱尔《认识东方》 周学立 / 281

跨文化广告传播活动中的冒犯问题研究 徐小娟 / 290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文化刻板印象与偏见的分析研究

陈叙 颜静兰 / 299

企业文化之“和”文化 王 崑 / 320

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学方法 / 329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式、方法论及其学科渊源 李加军 / 331

跨文化认知性与跨文化日耳曼学 王志强 / 344

德语教材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内容分析及对策建议——以《目标》为例

于雪梅 / 356

人文与科技文化结合视角下理工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思考

吴格非 / 368

跨文化适应

从濡化到适应:赴泰汉语教师 志愿者跨文化心理适应质化研究

安 然 魏先鹏

一、引言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上升,世界各地汉语学习热潮涌起,汉语国际传播需求加大,但是汉语教师却极度匮乏。为帮助世界各国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我国启动了汉语教师志愿服务项目。据国家汉办网站,自 2003 年国家汉办试点向泰国和菲律宾派遣首批志愿者以来,目前,国家汉办已向亚、欧、美、非、大洋五大洲派出 1.4 万多人次(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学厅〔2012〕3 号,2012 年 4 月 28 日印发)。志愿者以其出色的工作被誉为“民间大使”、“最可爱的人”。

汉语教师志愿者是汉语跨文化传播的直接承载者,而濡化(acculturation)则是外派汉语教师志愿者成功进行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心理濡化(psychology acculturation)问题,其关乎志愿者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成效。事实上,外派汉语教师志愿者多是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海外经历很少,受到的培训有限,适应状况兼多面向和复杂性于一体,是一个新生的旅居者群体,对于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心理濡化研究,既是对国际心理濡化研究是一个补充和拓展,也利于对汉语教师志愿者持续关注和帮助。

二、文献研究

(一) 濡化与心理濡化

濡化(acculturation)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持续地第一手接触

(continuous first-hand contact)之后,一个或两个群体最初文化模式的不断变化,Redfield et al(1936)强调这是一种现象(phenomena),既然是一种现象,那么就应该包括现象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此后,Redfield et al.的定义被视为经典,也是被濡化研究学者引用最多的定义。虽然“濡化”是一个用的很频繁的术语,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的含义和应用都很模糊(Sam & Berry, 2006, p. 11),有的学者将兴趣放在过程的考察上,如濡化变化如何产生,将濡化视为过程并加以定义(McGee, 1898; Simons, 1901),也有的学者将关注点放在濡化过程中哪些发生了变化,即濡化的结果(Sam & Berry, 2006, p. 16),前者占的比例更大。而我国的濡化研究(acculturation study)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甚至对于 acculturation 的翻译也有“涵化”、“文化适应”等多个版本,笔者认为 acculturation 是指分属不同文化群的个体之间进行持续性的直接接触(笔者理解为这就是“濡”),因而导致对某一个或双向原有文化形态改变的现象(笔者理解为这是“化”),其以个体为主体,朝着某一文化去适应,因此“acculturation”译为“濡化”更为合适。关于 acculturation 与中文概念的对应问题,笔者已另文阐述。

濡化现象源于欧洲人对殖民地土著人统治的需要。后来,研究逐渐关注移民在进入东道国社会后的变化。濡化一词(acculturation)一词最早由 Powell 提出,他认为濡化指的是由跨文化模仿(cross-cultural imitation)而引起的心理变化(Powell, 1880, pp. 176-208; Powell, 1883)。之后,研究的发展中,人类学家倾向于用濡化来表示从低等社会中来的群体与文明社会接触而变得进步起来的过程,而社会学家更喜欢用同化来更直接地表示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接触之后逐渐遵守当地社会生活习惯的过程(Sam & Berry, 2006, pp. 12-14)。

濡化研究发展至今,深度和广度已是先前研究所不能比拟的。濡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Berry 给出了濡化的内涵与外延,他认为濡化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及其中的个人间的结果而产生的文化和心理变化的双向过程,这些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内容常常包括学习东道国语言,认同东道国人的偏好,适应穿着风格和社交特点等,这些内容常常会在跨文化互动中产生压力和文化冲突(Berry, 2005)。濡化过程中可能包括一套比较容易实现的行为变化,如说话方式、衣着方式、吃饭方式,但同时也可能有不容易发生变化的一面,如个人的文化身份,进而产生濡化压力,如不确定感、紧张、失望等

(Berry, 1976)。濡化研究发展至今,研究框架业已完善,研究范围已经扩大至心理和社会文化两个面向。

而具体到心理濡化(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上,此概念由 Graves 提出,指的是个人在文化接触环境(culture contact situation)中,因与他文化接触及个人所在文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个体的变化(Graves, 1976)。后来, Berry 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差异:群体层面上的变化或者在群体社会结构层面,经济基础或者群体的政治组织中;个体层面上的变化发生于个人的身份、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而且这些方面的变化速度也是不同的(Berry, 1990, pp. 201 - 234)。

濡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心理濡化涉及情感的(affective)、行为的(behavior)和认知的(cognitive)变化,在个体层面见,被 Ward 等人冠以濡化的 ABC 理论(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Berry 将 ABC 理论总结为行为变化和濡化压力两个方面(Berry, 1997; Berry & Sam, 1997, pp. 291 - 326),这些变化往往成为短期濡化研究的关注点, Ward 和他的同事将心理上的和社会文化上的濡化现象区分开来,认为心理濡化指的是心理和情感的稳定和满足(Searle & Ward, 1990; Ward, 2001, pp. 441 - 445; Ward & Kennedy, 1993),这种区分是根据濡化理论研究两个层面提出来的,即“压力”、“适应”和文化学习(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其中,心理濡化研究看重人在濡化过程中的情感方面问题,属于压力和适应范畴(Lazarus & Folkman, 1984)。

如何经由濡化过程获得良好的濡化(跨文化适应)结果则涉及濡化策略问题。濡化策略常常包括在日常跨文化交往中表现出来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态度和行为,态度即个人对如何进行文化适应的偏好,行为则是个人的实际行为。Berry 于 1997 年提出了包括同化、整合、分离、边缘化的“濡化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Berry, 1997)。后来,对于濡化策略的选择和濡化压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结果显示,整合策略造成的压力最小,也会有最好的适应结果(Berry, Kim, Minde & Mok, 1987; Ward & Kennedy, 1994),而边缘化策略造成的压力最大,处于中间的是同化策略和分离策略,有时候这个会压力小些,有时候是另一个,这些发现的模式成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示标志(Berry, 1997; Berry & Kim, 1988, pp. 207 - 236)。关注个体心理濡化过程研究的成果显示,心理问题经常在